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

政治游戏中的 一张王牌

——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

何 兰 / 著

ZHENGZHYOUXIZHONGDE
YIZHANGWANGPAI

吉林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

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

——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

何 兰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 ——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

著 者 何 兰

责任编辑 李书源

责任校对 邢淑萍

封面设计 张 迅

版式设计 吴 俊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长春市康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125 插页 4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680-5/D·967

定 价 15.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序

何兰同志的学术专著《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在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发行之前，我有幸先行读过。那是在1999年10月受武汉大学研究生院之邀，主持何兰同志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答辩前后。我一拿到寄送的书稿，就被其新颖的选题和章节题目紧紧抓住；细读之时，兴趣盎然，时时被其颇具胆识的立论、精彩严慎的论述和翔实珍贵的资料所吸引；掩卷之余，回味无穷，不仅从书中受到诸多启示，而且引发我对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中德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问题进行反思，感慨不已。

这部著作，是何兰同志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史、德国史、特别是近5年来集中进行中德日大三角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应该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对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本书共分9章，从全新的角度，具体而深入地考察了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从不承认至事实上承认直到公开承认的演变阶段及其实际过程，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变化的历史根源及其特点，并从中德、德日关系角度探讨了其与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关系，最后总结了研究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颇有教益的启示。本书用希特勒的话为名，一下子就点出和突现了德国对伪满这一日本傀儡政权政策的实质和特点。德国对伪满政策，实质上是对日政策，伪满只不过是德国向日本讨价还价和争取获得更大利益的筹码和王

牌，全书始终贯穿了这条主线。

本书明确阐释了德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对伪满洲国政策发展的基本轨迹并进行了精细的论说。本书认为，从 1932 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成立至 1933 年 2 月 24 日，是德国对伪满洲国不承认政策的确立阶段，这一不失为明智和现实的政策，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是“秉持正义”，而是基于德国自身的利益考虑。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上台至 1938 年 2 月 20 日希特勒发表演说正式承认伪满之前，是德国对伪满从不承认到事实上承认的演变阶段。该阶段的特征是，德国已接受伪满的既成事实，并将“承认”作为在政治、经济上与日本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承认”只是一个选择时机的问题。由于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形势的变化，这一阶段的德国对伪满政策，是待价而沽的实利主义政策。从 1938 年 2 月 20 日至纳粹德国战败投降，是德国对伪满政策从事实上承认到正式承认的确立和实施阶段。在这一阶段，德国远东外交的重点是彻底改变传统的对远东“中立”的政策，促进德日建立军事联盟。这是一种背信弃义的市侩伎俩与投机冒险政策。此后，德国同日“满”的勾结进一步加强，最终导致中国与德国在 1941 年断绝外交关系。

本书最突出的优点是：不仅清晰梳理和勾画出德国对伪满政策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轨迹，而且着重从德国政治、经济状况和利益需要方面分析了各个阶段及其特征形成的原因，充分体现了外交是本国政治经济政策延伸、继续的思想，因而本书对德国对伪满政策的剖析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和说服力。

本书在阐述德国对伪满政策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实质时，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创新性的独到见解。本书认为，“魏玛时期德国的远东政策在‘不干预’的背后具有明显的亲日倾向，但毕

竟与纳粹政权的对伪满政策有所不同”；“德国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是袒护日本”；“在希特勒早期思想形成时期，其远东意识中就具有亲日贬华倾向”；“德国外交部职业外交家与纳粹领导集团，并非是两个始终处于矛盾、对立状态的群体”；“德国与伪满洲国签署的贸易协定，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协定，而是含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意义的交易书，它是德国对伪满政策演变过程中的一块重要界碑”等等。

本书还从更广阔的视野阐述了当时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对欧洲的局势与德国政治变迁、德国总体对外政策和地区性政策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过程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亦提出了颇有价值的重要观点。如本书认为，在1937年以前，希特勒对英国的态度是“一直把英国看作是德国最有价值的同盟者”。这对研究1937年前德国的外交政策、欧洲局势的变化，特别是英德关系，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的新观点随处可见，并均做到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颇具说服力。

伪满洲国问题，是中日关系中十分敏感的问题，却也是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关于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专题研究，据我所知，国内学者只有房建昌的《伪满与德国的交往》和张北根的《德国对待承认“满洲国”问题的态度》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此外仅在对德国远东政策、民国史、民国外交史、中德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等著作中有所涉及。海外的研究虽已有一些成果，亦十分薄弱，存在诸多缺欠与不足。故本书的研究，不仅填补了我国学术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且弥补了海外研究的一些缺失疏漏，纠正了其观点的偏颇，深入挖掘和探讨了其忽视的许多问题，从而走上了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其资料极其丰富。从本书的引

文注释，既可充分看出作者对核心文献资料的极端重视，也不难想象她为发掘每项新资料所付出的艰辛。她充分利用两年的在日访问研究、赴欧洲考察机会，不辞辛劳地广泛收集西文、日文的有关资料。她年复一年不畏艰苦地在浩如烟海的《外交政策文件》、《年鉴》、《政府公报》、《回忆录》和《日记》中，如大海捞针般地搜寻。经过精选后，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政府文件等珍贵资料，其中许多资料是首次在国内使用。这些核心文献、资料数据均十分扎实、严谨，从而充分有力地政论了所提出的新观点。

何兰同志是一位中年学者，在中国著名专家的指导下，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曾在日本作为访问学者研修2年，又有旅欧之经历，这些均使她有机会充分吸收中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广采中外著名学者之所长，从而具有坚实厚重的专业功底。值得提及的是她刻苦扎实的努力。近年来，她不仅负责和承担了数项国家级和部级社科研究规划项目课题，而且担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讲授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世界近现代史、日本史等数门课程，先后出版独著与合著10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这些丰硕成果，无不凝聚了她的辛劳和汗水。“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课题研究。本书的出版，可以算是对她的最好回报吧，亦是令我等同仁稍感欣慰的。

何兰同志这部我国首次研究德国对伪满政策的学术专著，自然不是无可挑剔的，如德国对伪满政策的演变与德国扩军备战的过程以及欧洲军事形势的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本书的重视程度似还嫌不够。书中的一些技术处理亦不是无懈可击的。

但瑕不掩瑜。我以为本书确实是部值得一读的好书，愿在

这里对其出版表示衷心地祝贺，亦愿诚挚地向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推荐这部著作。

最后，由衷地祝愿和期望何兰同志能在遥遥学途上，在陡峭崎岖的科学山路上，不畏艰难困苦，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攀上新的风光无限的高峰。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

汤重南

2001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远东政策的特点

——为重返远东而斗争 (11)
一、对魏玛德国远东政策特点的几种不同认识 (11)
二、一战后远东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 (14)
三、德国为恢复大国地位而斗争 (22)
四、魏玛德国远东政策分析 (30)

第二章 德国不承认伪满洲国政策的确立

——在国联大会对《李顿报告书》
投赞成票 (49)
一、“九·一八事变”与列强的态度 (49)
二、德国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62)
三、伪满洲国的建立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75)
四、德国不承认伪满洲国政策的确立 (84)

第三章 希特勒心目中的世界

——“大德意志帝国”梦中的远东观 (96)
一、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帝国”梦想 (96)
二、希特勒眼里的中国和日本 (106)
三、德日关系的升温 (113)

第四章 对不承认政策的第一次冲击

——“海耶事件”	(123)
一、纳粹党试图改变对伪满政策的 工具——海耶.....	(123)
二、海耶活动失败原因分析.....	(132)

第五章 对不承认政策的第二次冲击

——“狄克逊事件”	(146)
一、“狄克逊事件”始末	(146)
二、狄克逊态度转变的原因剖析.....	(154)
三、“王牌论”和“提前半小时承认论”的提出	(163)

第六章 从不承认到事实上的承认

——《德“满”贸易协定》的缔结.....	(175)
一、德国外交部对伪满洲国政策的重点.....	(175)
二、派遣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伪满主张的提出.....	(180)
三、德国外交部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184)
四、德国远东经济考察团的组建风波.....	(190)
五、《德“满”贸易协定》的签订	(198)

第七章 举棋不定的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

——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	(212)
一、德“满”关系的加强与发展.....	(212)
二、德国在正式承认伪满问题上举棋不定的 原因.....	(216)
三、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	(223)

第八章 从举棋不定到公开承认

- 德国对伪满洲国公开承认政策的确立…… (234)
一、纳粹德国的战争准备…………… (234)
二、德国公开承认伪满的具体原因分析…………… (249)
三、德国承认伪满洲国的实质与影响…………… (263)

第九章 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总析（代结语）…………… (276)

- 一、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演变阶段及其特点 …… (276)
二、中德关系与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 …… (279)
三、德日关系与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 …… (283)
四、研究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启示 …… (286)

参考书目…………… (304)

后 记…………… (310)

导 言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刺刀的扶植下，一小撮汉奸、卖国贼在我国东北地区上演了一场“满洲国建国”丑剧，伪满洲国粉墨登场。

在历史的长河中，伪满洲国无非是一股暂短的逆流。从国际法意义上讲，伪满洲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而只是日本的傀儡国、殖民地。伪满的外交，如同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结构一样，均是其宗主国日本的附属物，甚至在一部几乎全部由曾在伪满政治、经济、司法、文教、军警宪特、厂矿企业等部门中担任过要职的日本人所撰写的《满洲国史》中也承认：“满洲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同日本结成亲邦关系，并以日满‘一德一心’作为国政的核心。因此，满洲国的外交，其大半自然是同日关系，其余在对苏、对华外交的重要问题上，总是在日本介入和绝对支持下推行的。这在收买北铁、处理国境纠纷、满华关系等事例中，是显而易见的。仅在对德、意的欧洲关系上有某些自主的经济外交，但其中也有许多是经由日本中介或斡旋的”。^①当然，其所指的“在对德、意的欧洲关系上有某些自主的外交”，如同本书后面将要分析的，实质上也只是日本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

^① (日)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上卷，东北沦陷14年史吉林编写组译，1990年内部资料版，第583页。

但是，伪满洲国毕竟是出现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历史现象。自它出笼后，必然会、也确实发生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和联系，并且与一些国家和政权建立了所谓“正式关系”。^①这是一种客观存在，自然也是无法回避的。因此，研究其它国家对待伪满洲国的态度和政策，探讨伪满洲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工作，也不是用研究其它国家对日本的态度和政策所能代替得了的。

伪满洲国出现以后，德国工商界部分利益集团，对于趁机拓展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魏玛政府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德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德国在国际社会中孱弱的地位，以及英、美等列强的矛盾态度，采取了不承认伪满洲国的政策。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党领导人的亲日倾向，一度造成德国对伪满政策波澜汹涌，几乎冲垮不承认政策的堤坝，只是由于德国外交部、国防部和一部分热心于对华贸易的利益集团力阻，才勉强维持不承认政策堤坝不溃。

然而，在纳粹党对外扩张思想影响下，德国的不承认政策已是千疮百孔，外交部在伪满问题上的态度，也已悄然发生变化。不承认原则渐渐被淡忘，伪满越来越被视为德国在远东政

^① 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并与之建立所谓“外交关系”的，主要是加入轴心国集团的国家，或由德国和日本等扶植的傀儡政府，此外，还有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计有：日本（1933年）、菲律宾（1934年）、萨尔瓦多（1934年）、罗马教皇国（1934年）、多米尼加（1934年）、意大利（1937年）、西班牙（1937年）、德国（1938年）、波兰（1938年）、立陶宛（1939年）、匈牙利（1939年）、斯洛伐克（1939年）、罗马尼亚（1940年）、保加利亚（1940年）、芬兰（1941年）、丹麦（1941年）、泰国（1941年）等。此外，还有一些与伪满洲国缔结过疆界、邮政、交通、经济等具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

策中的一个筹码，如同希特勒所说，是“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在需要的时候打出来与日本讨价还价。随着纳粹德国扩军备战步伐的加快和结盟战略的转变，希特勒越加看重日本在其称霸世界战略中的作用，把改善和加强与日本的关系作为当务之急，并最终改变在伪满问题上的立场，打出“承认”这张“王牌”，以便从日本那里得到政治、经济上的回馈，实现德日联盟。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中公开宣布承认伪满洲国，抛弃了维持近6年的不承认政策。因此，说到底，德国对伪满政策是其对日政策的一部分，伴随着对日政策的调整而改变。

虽然德国直到1938年才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在所有与伪满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除日本外，德国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并未从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它仍然是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特别是自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更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焦点，其地位和影响是其它承认伪满的国家无法比拟的。其次，德国承认伪满不仅仅是建立一种所谓的正式“外交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德国远东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魏玛时期以来沿袭的“均衡”、“中立”政策，改变为亲日弃华的对日一边倒政策，对德中关系和德日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其它国家所不能相比的。

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经历了一个由不承认——事实上承认——公开承认的演变过程，而这一演变的大背景，是德国从魏玛共和国蜕变为纳粹法西斯统治。在这一时期，纳粹党的对外扩张计划与魏玛共和国“保守”、稳健传统政策的矛盾；纳粹党的亲日、袒日倾向与德国在中国巨大利益的矛盾；德国在

远东追求的目标与日本侵略野心的矛盾等等，相互交错，互为影响，使得德国对伪满政策的演变跌宕起伏，耐人寻味。

伪满洲国问题是中日关系中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德国对日、对华政策中，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德国对伪满政策，自始就是德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犹如一面反光镜，不仅折射出德国自身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映照出德国对华、对日关系的走向。

然而，迄今为止，关于本专题的研究成果仍是凤毛麟角。国内学者只有房建昌、张北根等的几篇论文。国外现有的相关成果主要有：德国学者 G·拉腾霍夫所著《德国和 1931—1933 年围绕满洲的国际危机》（G. Ratenhof, Das Deutsch Reich und die Internationale Krise um die Mandschurei 1931—1933），书中利用大量资料叙述了德国经济界对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兴趣，探讨了魏玛共和国末期和希特勒上台之初，德国在满洲问题上的态度，是研究 30 年代初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代表作。再就是日本学者田岛信雄所著《纳粹外交与“满洲国”》（ナチズム外交と“满洲国”）。该书一反对外政策研究偏重于政治分析的传统，着重分析经济贸易关系在 1933—1936 年德国对伪满政策演变中的作用，令人耳目一新。除此之外，一些相关的研究，大都散见于有关德国远东政策、德日关系、德中关系的研究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英国学者约翰·P·福克斯所著《德国和远东危机 1931—1938》（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该书着重于分析德国统治阶层内部在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意识差异，资料丰富，论述有理，至今仍为西方学者在本专题研究方面的扛鼎之作。总之，国外学者利用已刊或未刊公私档案，在德国对伪满政策的专题研究和“擦边”论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对本专题所涵盖的

主要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争议，为我们系统研究本专题给予很大启发，提供了许多帮助。但是，总的看来，关于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许多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深入探讨，主要问题和不足在于：

第一，有些学者虽然在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方面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或局限于某个时期，或作为德国远东政策、德中关系、德日关系研究的某一部分，因此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例如，拉腾霍夫的研究只限于 1931—1933 年；田岛信雄的著作主要分析希特勒上台后，1933—1936 年间的德国对伪满政策；福克斯的研究虽然包括了 1931—1938 年，但他只是把德国对伪满政策作为其远东政策总体的一部分，而其自身的系统、完整性被削弱了。由此可以说，在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方面，尚缺乏完整、系统性，还不能勾画出德国对伪满政策形成、确立、发展及演变的基本轨迹。

第二，尽管一些学者对于德国对伪满政策演变中某些重要事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但是，由于缺乏完整、系统研究，以致不能正确认识德国对伪满政策发展的各个阶段，更不能揭示每个阶段的特征。例如，有些学者往往只是简单地把从 1932 年伪满洲国出现，到 1938 年德国对其正式承认这一时期的德国政策，笼统地视之为“不承认”阶段，^① 而看不到每一阶段所发生的细微变化，其结果又

^① 福克斯虽然分四个时期论述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1931—1933 年的魏玛政府和“满洲危机”；1933—1935 年的希特勒篡权及其对“满洲国”政策的冲击；1935—1936 年的德“满”贸易协定；1938 年 2 月—7 月的公开承认，但是，对每个时期的特点则未予以深入分析和明确揭示（参见福克斯所著《德国和远东危机 1931—1938》，第 9—51、146—174、291—331 页）。田岛信雄把 1933—1936 年都看作是德国在伪满洲国经贸政策上意见分歧的时期（详见田岛信雄著：《纳粹外交与“满洲国”》，第 113—246 页）。

影响了我们对于德国对伪满政策整体演变过程的认识。

第三，希特勒上台之时，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远东政策？有些西方学者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外交思想形成时期较少论及远东问题，以及希特勒执政初期，德国对远东政策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得出了希特勒上台之初没有明确的远东政策之结论。^①我们知道，德国对伪满政策，是其远东政策的组成部分；德国远东政策的性质、走向，决定了其对伪满政策的性质和内容；而德国对伪满政策的变化，往往又可视为德国改变远东政策的一种征兆。在希特勒早期思想形成时期，固然对远东问题谈的不多，但是，在其远东意识中的亲日贬华倾向，则始终贯穿于他上台后对远东问题的认识之中，并明显反映在他对伪满洲国问题的态度上。此外，史料表明，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试图把从魏玛时代遗留下来的“中立”远东政策改造成符合他的意愿的亲日远东政策。可以说，希特勒是有着明确的远东政策意图的。

第四，希特勒统治初期，德国对伪满政策由于受到纳粹党对外扩张思想影响，呈现出动摇不定的现象。一些学者正确地指出了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对伪满政策上意见

^① 德国学者埃克塞·库恩以希特勒在其《我的奋斗》、《第二本书》和其它演讲中很少谈及中国和日本为例，认为在希特勒对外政策思想形成时期，对远东的作用和地位，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见其所著《希特勒外交纲领的形成和发展 1919—1939》，A. Kuhn, Hitlers ausserpolitisches Programm,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1919 – 1939；斯图加特 1970 年版，第 188 页）。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乌维·P·法布里切克（见其所著《黄龙与黑鹰》，Uwe G. Fabritzek, Gelber Drache, Schwarzer Adler，慕尼黑 1973 年版，第 121 页）；格哈特·温伯格（见其所著《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编，何江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4 页）。芝加哥大学教授江昭则以 30 年代初，德国在东亚表现出“双轨性政策”为据，认为此时希特勒还“没有什么亚洲政策”。（转引自费正清、费维凯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2 页）。